



日俄战争与日本第二次军用汉语热^{*}

——以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出版为中心

寇振锋

内容提要 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社会出现了自甲午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性汉语学习热潮,其主要表现为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大量出版以及出征部队对汉语教科书的大量需求。此期间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根据其所涉军事或军用内容,可以分为“纯军用”与“准军用”两种类型。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反映了当时日本军部对在中国领土上发动战争的精心策划与全盘准备。这些军用汉语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能够使日军军事顺利推进的隐形武器,由此带来的畸形的汉语教科书出版热值得深思。

关键词 日俄战争 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 军用汉语热 出版热

在日俄战争10年前的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军方掀起了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以出版发行军用汉语教科书为主的汉语热。在甲午战争横跨的两年时间里,日本共出版汉语教科书43部,其中军用汉语教科书为27部,所占比例超过半数。^①那么,日本近代以来的第二场海外战争——日俄战争时期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日本汉语教科书研究的权威学者六角恒广、张美兰、李无未,都曾经对明治时期的日本汉语教科书做过收集整理,但三人并未专门从军用的角度予以详论,也未对日俄战争期间的军用汉语教科书予以单独考证。^②据笔者管窥,目前学界尚未有考释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军用汉语热的研究成果。

据六角恒广的考证,在1903—1906年间,即日俄战争的两年及前后各一年的四年时间里,出版

^{*}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研究”(17BYY208)、2015年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项目“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汉语教科书研究”(Y201501)的阶段成果。本文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提出诸多宝贵意见,谨致谢忱。本文所举例词、例句散见于所引汉语教科书各处,故不一一注明页码。

① 寇振锋:《甲午战争与日本军用汉语热探究——以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出版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0—113页。

② 参见六角恒广的《中国語教本類集成》(第1—10集)(不二出版,1991年)和《中国語関係書目:1867—2000》(增補版)(不二出版,2001年);张美兰:《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汇刊》(1—2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无未:《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1—60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

的军事警务相关汉语书籍仅有3部^①,那么事实上果真有如权威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吗?经笔者详细考证确认,在日俄战争前后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至少有79部之多。^②本文之所以在此称之为第二次军用汉语热,是为了区别于甲午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军用汉语热。而且此次汉语热的炙热程度已经远远超出第一次汉语热,值得我们探究与反思。

本文以日俄战争前后出版的日本汉语教科书以及军事档案为基础文献,并根据汉语教科书的内容明确其属性,从军用语的角度分析此次汉语热潮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梳理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轨迹及此次汉语热的主要特征。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当时日本对日俄战争所做的精心策划与全盘准备,并由此探究此次军用汉语热的根源。

一、军用汉语热出现的土壤

众所周知,横跨1904和1905两个年度的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日本与俄国为重新瓜分中国东北与朝鲜,进而争夺亚洲及太平洋霸权的战争。

为何日本与俄国两国之间的战争带来了日本近代历史上的第二次军用汉语热?据笔者分析,有如下几点诱因值得关注。

第一,日俄战争的主战场在中国东北。日本军人来到陌生之地参战,必然要与当地中国人打交道,这是汉语热出现的主因。

第二,已有成功经验可循。在第一次汉语热期间,日本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达27部,这些教科书在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纯军用汉语教科书《满洲语会话一个月卒業》的序言中就指出:“编者作为翻译随军参加过甲午战争,经常辗转于各个战场,具有一定的经验,此次又以同地为战场,其语言必不可少。”^③这些成功的经验无疑成为日俄战争的预演与铺垫。正由于已有甲午战争的成功先例,军用汉语教科书出版热已是大势所趋。

第三,认识到军人掌握汉语的重要性。如第四军兵站监部就已经认识到军人掌握汉语的重要性:“兵站部人员因其业务上的需要,必然经常与清国土人接触。故此,通其语言与否,对于业务能否顺利运转,具有显著影响。”^④另外,曾作为甲午战争的随军翻译,在日俄战争时期再次作为随军翻译的田川大吉郎,在为《对译清语语法:附录支那时文速知》撰写“跋”时提到:“余前后数次痛感,若军人熟知军务之巨细,占有操使语言之便利,再多掌握些翻译本领益善。”“我军人若能同时操使清语,其行动会更加便捷,其满洲战役之功绩会更上一层,深感不能满足其有更大成果”。^⑤可见,田川已充分认识到了军人不能掌握汉语之欠缺。这些感悟并非出自常人之口,而是亲临两次战争的随军翻译人员的经验之谈。又如,陆军中佐有田恕在攻克南山及得利寺的战役之后,也充分认识到军用汉语教科书《军用日清会话》在战争中,“利我军大矣,实佳撰”。^⑥因此,军人掌握汉语,以

① 六角恒広編『中国語関係書目:1867—2000』(増補版)、100頁。

② 由于条件所限,目前仍有10余部汉语教科书未能确认,有的只有书名,但已无从查证。在此特向为本文提供宝贵资料的日本目白大学的冰野善宽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③ 大澤「编者識」、『满洲語会话一ヶ月卒業』、石塚猪男蔵(出版人)、1904年、1頁。该教科书未注明编者,但书后广告“石塚書舗出版清語科書”中有:“大澤先生著满洲語会话一ヶ月卒業”。据此可确定编者姓“大澤”。另外,此处的“满洲语”并非“满语”,而是“汉语”。

④ 「明治37、8年戦役に於ける第4軍兵站部の経歴(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3110421900、第4軍兵站監部経歴意見書 明治37~8年戦役(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⑤ 田川大吉郎「跋」、来原慶助編『対訳清語活法:附録支那时文速知』、三省堂書店、1905年、1頁。

⑥ 有田恕「実用日清会话序」、汤原景政編『実用日清会话』、大阪石塚書舗、1905年、1頁。

及军用汉语教科书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有利于军事需要。通过汉语教科书,除了军人可以自身掌握军事用语外,还可驱使中国人充当侦察俄国军情的间谍,因为作为第三方的中国人不易被怀疑。另外,抓捕中国百姓充当苦力,为日军修建军事工事、搬运弹药和运送伤员等,必然要与中国人打交道。随军翻译人员的配备毕竟有限,这就需要军人通过汉语教科书来掌握汉语。

第五,有利于生活需要。由于主战场在中国东北,日军要想借宿、购买生活品、募集粮草、征集牲口等,必然要用汉语与中国人交流,因此掌握汉语对日本军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前线指挥官都建议在纯军用汉语教科书中加入日常套话。^①显然,日常套话对军人的生活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六,有利于博得中国人的好感。为了使战事顺利进行,可以让军人通过汉语教科书向中国人进行友好宣传,以博得好感。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军用汉语教科书中都有试图博得中国人好感的语句。

第七,编者的敏锐嗅觉。有编者指出:“故东洋问题被关注之时,支那必首当其冲。由此可见,支那语之于将来必大有必要。”^②可见,编者预感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必然带来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大量出版。两次战争的随军翻译田川大吉郎也认识到:“诚然,今日日俄之战,早晚会有穷期,然而日本之于满洲之将来关系,会绵绵未有穷期。”^③

第八,两国之间暧昧关系的出现。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以及民间人士出于对东北主权的考虑,并未完全保持“中立”,而是暗中采取“联日抗俄”的做法。^④因此,在这场战争中,由于两国关系的转暖,作为重要媒介的汉语教科书必然受到重视。

总之,之所以出现了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热,根本原因在于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军人急需掌握汉语,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也就顺理成章。上述几点,无疑为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大量产出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与环境,为军用汉语热在日本的快速“升温”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全国上下为战争而做出的全方位准备。

二、日俄战争与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热

日俄两国开战前,日本在教科书出版上的准备已经有所显现,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军用汉语热再次以军用汉语教科书大量出版的形式表现出来。

笔者按照教科书中关涉军用或军事内容的比例多少,将军用汉语教科书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纯军用”,即教科书内容主要为军事用语,大都涉及行军、侦察与反侦察,以及如何命令、恐吓、奴役中国人的言语表现等;另一种为“准军用”,即紧密围绕军用或军事的语言相对较少,虽然仅占部分章节或段落,但其内容上却不失军用特性,表现出战争狂热所催生出来的时代特性。另外,警务、司法等汉语教科书也列入“准军用”范围之内。笔者基于上述分类方法,将日俄战争时期的军用汉语教科书进行了适当归类并予以梳理。

为了尽可能客观地考察日俄战争与军用汉语热之间的关系,笔者按照时间顺序,分为战前、战

① 有田恕「实用日清会话序」、汤原景政编『实用日清会话』,1页。

② 东洋学会「緒言」、『清語会话速成』、又間精華堂、1904年、1页。

③ 田川大吉郎「跋」、来原慶助编『対訳清語活法:附録支那時文速知』,2页。

④ 喻大华:《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文史哲》2005年第2期,第118—126页。

时和战后三个阶段,即1903年为战前,1904年和1905年为战时,1906年为战后,并分别考察各个时间段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情况。

(一)1903 年度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

据笔者统计,在开战前一年的1903年,日本共出版汉语教科书17部^①,其中4部为准军用汉语教科书,所占比例为23.5%。这说明战争前一年的军用汉语教科书出版尚处于“平静期”。该年度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如表1所示。

表1 1903 年度军用汉语教科书

类 别	书 名	编 者	出版社(人)	刊行时间
准军用	《改订增补清国时文辑要》	足立忠八郎	石丸铁三郎	1903.5
准军用	《新编支那语会话读本》	青柳笃恒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03.8
准军用	《官话篇》	宫岛大八	善邻书院	1903.9
准军用	《日清会话问答:对译》	西岛良尔	松云堂	1903.10

《改订增补清国时文辑要》的“自序”中指出,义和团事件后“两国交谊,现无隔膜”“近来学支那语言者,逐日加多”。该教科书中有关军事的时事达15件,表现出对军事的高度关注。

《官话篇》的编者宫岛大八曾在中国留学8年,是地道的中国通。因甲午战争爆发,恐牵连中国老师一家而回国。^②《官话篇》中的军事用语有:“现在的军机都是谁?”“这宗炮能打多远儿?”“日本人最讲究刀。”“现在北洋的武备都整顿了。”“现在大连湾归那国管了。”“兵不在多,总得训练。”而且宫岛大八已经预感战争的临近:“他们两国打仗,你想那国胜?那一定是某国胜。怎么见得呢?兵也多饷也足,又会调度,怎么会不胜呢?”

《日清会话问答:对译》中有“军事问答(一)”和“军事问答(二)”两章,共13页的军事内容。编者西岛良尔,原为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学员,是甲午战争的随军翻译,日俄战争时期再次作为随军翻译,踏上了中国领土。

我们据参谋本部的“庶秘第109号之1”电文可知,参谋本部的总务部长于1903年7月7日,要求宪兵司令官将以特殊手段入手的1部《露清会话》送至参谋本部。^③这说明军方在开战前一年的1903年,就已密切关注汉语和俄语方面的教科书,军方对语言的战前准备工作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虽然开战前一年的1903年仅出版4部军用汉语教科书,且尚未出版纯军用汉语教科书,但已充分表现出对战争的预见性。

(二)1904 年度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

据笔者统计,日俄两国开战当年的1904年,日本共出版了42部军用汉语教科书。2月份出版7部,5月份就以平均2.5天1部的速度出版了12部,达到了出版发行的最高峰。1904年度共出版63部汉语教科书。^④也就是说,该年度出版的汉语教科书中有66.7%为军用汉语教科书。具体军用汉语教科书如表2所示。

① 六角恒广认为1903年度共出版14部。参见六角恒広編『中国語関係書目:1867—2000』(増補版)、100頁。
② 寇振锋:《日本汉语教材〈急就篇〉的编刊及影响》,《国际汉语学报》2015年第2辑,第176—181页。
③ 「露清会話一部手に入れられ御送付方及御依頼」、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9123023800、明治36年自7月至12月秘密日記 庶秘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电文中出现的《露清会话》的具体内容不详,但从书名来看,属于语言教科书。
④ 六角恒广认为1904年度共出版53部。参见六角恒広編『中国語関係書目:1867—2000』(増補版)、100頁。

表 2 1904 年度军用汉语教科书

类 别	书 名	编 者	出版社(人)	刊行时间
纯军用	《出征必携:日露清韩会话》	山本富太郎	则鸣社	1904. 2
纯军用	《兵事会话:支那语速成》	宫岛大八	善邻书院	1904. 2
纯军用	《北清通话:兵时会话》	善邻书院	善邻书院	1904. 2
纯军用	《日清会话附军用语全》(第 9 版)	木野村政德	日清协会	1904. 2
纯军用	《日清对译:战阵要语》	不详	不详	1904. 3
纯军用	《满洲土语案内》	第一军司令部	无(手写本)	1904. 3
纯军用	《兵时告示文范:清国时文》	善邻书院	文求堂	1904. 3
纯军用	《军用日清会话》	汤原景政	厚生堂	1904. 3
纯军用	《满韩土语案内:袖珍实用》	平山治久	博文馆	1904. 4
纯军用	《满洲语会话一个月卒业》	大泽	石塚猪男藏	1904. 5
纯军用	《从军必携:日满会话》	岛田孝治	藤谷寅藏	1904. 5
纯军用	《日清会话全》(第 5 版)	参谋本部	一二三馆	1904. 5
纯军用	《日清露会话》	粕谷元、平井平三	文星堂	1904. 9
纯军用	《日清会话》	参谋本部	川流堂	1904. 10
准军用	《日露清韩会话自在法》	武智英	日本馆	1904. 2
准军用	《对译日露清韩会话:军人商人必携》	米村胜藏	启文社	1904. 2
准军用	《支那时文读本:标注(上下)》	大野德孝	大日本图书	1904. 2
准军用	《对译日露清韩会话:军人商人必携》再版	米村胜藏	启文社	1904. 3
准军用	《新编中等清语教科书》	西岛良尔、林达道	石塚松云堂	1904. 3
准军用	《日清会话》	三宅省一	三宅省一	1904. 3
准军用	《战地宝典:征露从军者必携》	酒井弥吉郎	同盟堂	1904. 4
准军用	《日露清韩实用会话》	池村鹤吉	松阳堂	1904. 5
准军用	《日露清韩会话自在》	通文书院	玄牝洞	1904. 5
准军用	《日露清韩会话早学》	小须贺一郎	又间精华堂	1904. 5
准军用	《日露清韩会话速成》	小须贺一郎	又间精华堂	1904. 5
准军用	《实用日清会话独修》	铃木云峰	修学堂	1904. 5
准军用	《清语三十日间速成》	西岛良尔	青木嵩山堂	1904. 5
准军用	《清语与清文》(创刊号)	伴直之助	东枝律书房	1904. 5
准军用	《北京官话:支那语学捷径》	足立忠八郎	金刺芳流堂	1904. 5
准军用	《清语读本:后编》	东方语学校	金港堂	1904. 5
准军用	《警察会话篇》	台湾总督府警察官及 司狱官练习所	台湾日日新报社	1904. 5
准军用	《言文对照北京纪闻》	冈本正文	文求堂	1904. 6
准军用	《日清会话独习》	山岸辰藏	东云堂	1904. 7
准军用	《清语会话速成》	东洋学会	又间精华堂	1904. 7
准军用	《官话急就篇》	宫岛大八	善邻书院	1904. 8
准军用	《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	足立忠八郎	金刺芳流堂	1904. 8

续表 2

类 别	书 名	编 者	出版社(人)	刊行时间
准军用	《北京官话:支那语学捷径》	足立忠八郎	金刺芳流堂	1904. 9
准军用	《在清从军者之心得》	青柳笃恒,原口新吉	清语学堂	1904. 9
准军用	《日清会话问答》(第 3 版)	西岛良尔	石塚书铺	1904. 10
准军用	《初等官话教程》	原口新吉	文求堂	1904. 11
准军用	《支那时文评释》(36 年度)	青柳笃恒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04
准军用	《续支那时文评释》(37 年度)	青柳笃恒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04

1. 纯军用汉语教科书:

该年度出版的纯军用汉语教科书达 14 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出征必携:日露清韩会话》一书,其首条“凡例”即指出:“本书贯通日露清韩,收集对出征者而言,尤为必需之会话。”该教科书采用日语与俄、清、韩三国语言对照的形式,出现的军用语有:“炮队”“步队”“兵丁”“营房”“兵房”等战场上的常用语。

又如《兵事会话:支那语速成》,编者在“凡例”中指出:“此书专为战地使用编纂而成。”“此乃军国多事之秋,聊以益于我忠勇义烈出征将士,则为著者之本意。”而且“兵用语为参酌有经验将校之建言,相信在应用上颇为贴切。”可见,该教科书中的军用语不仅来源于实践,并且是经斟酌之后确定的。书中的军用语主要包括“行军”“宿营”“警戒”“运输”“讯问”“看护”“慰抚”以及“军用地名”等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内容。

参谋本部编《日清会话》,最初是为甲午战争而编纂的。然而,10 年后的日俄战争期间,又多次再版发行,战场上对其依赖程度不言而喻。书中的军用语颇具代表性:“若是跑就杀你!”“把守炮台的兵有多少?”“要是不答应呢就把洋枪打死你!”“放火烧那个房子。”等等。

《日清对译:战阵要语》现藏于东京大学鸥外文库,鸥外文库即日本明治时期文学巨擘森鸥外的藏书。森鸥外原名森林太郎,曾作为军医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对他来说,使用汉语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基本可以断定,森鸥外携带并使用过《日清对译:战阵要语》,否则该书不会列入其藏书之内。而且,据当时日军的“秘”字电文可知,该教科书也被日军携带至战场之上。^① 编者在“例言”首条即明确指出:“本书专为出征诸士提供些许帮助,特收集简易兵用语,编纂而成。”相关内容如:“这儿有米没有? 麦子呢?”“打那儿来的?”“你不是俄国的奸细么?”“探听我们的军情来的罢?”这些粮食收集、侦察斥候等用语,正符合军用特性。

《满洲土语案内》的编者署名为“第一军司令部”,实为第一军的随军翻译来原庆助。“凡例”首条指出:“本书以资满洲军队行动之便,编纂而成。主要收集对军事行动有必要之语言,略去其他。”其纯军用特征比较明显:“复州城里有俄国兵没有? 我们不知道俄国兵有没有。你若撒谎我杀你,你说实话! 我想有三四千兵。”而且在制成小册子后紧急印刷 8000 部,发往第一军司令部。^② 足见该书的使用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

① 「2. 16 総参謀長より第 2 軍参謀長報告の件及通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6040721000、明治 38 年 1・2 月分副臨号書類綴大本営陸軍副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据该史料记载,牛居守备队在撤退时,遗弃的书籍中就有『日清对译:战阵要语』,其中步兵第二联队本部 9 部,第二联队第二大队本部 20 部。

② 「满洲土語案内送付の件松石大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6040603400、明治 37 年自 3 月 17 日至 4 月 23 日副臨号書類綴大本営陸軍副官管第 3 号自第 601 号至第 900 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满洲语会话一个月卒业》，其编者大泽是甲午战争时期的随军翻译，从亲历者的角度编纂该书，无疑更具有针对性与实用性。相关的句子如：“我托你带道的行不行？”“拿洋枪杀他！”“拿刀砍他！”“拿枪刺他！”“你来这儿不要害怕，我是日本兵。”等。

2. 准军用汉语教科书：

该年度出版的准军用汉语教科书达 28 部。代表性的《对译日露清韩会话：军人商人必携》，初版发行于开战伊始的 2 月 27 日，仅 6 天后的 3 月 5 日就再版发行，其需求量之大可见一斑。编者在“绪言”中表明了编写目的：“今日日俄开战，兵马倥偬羽檄飞，俄清韩方面日益多事，编者鉴于此，创率编纂此书，聊以渡海者之便益。”为战争时局之便，该教科书除普通会话外，附有军用会话及军用单词。综合来看，该教科书以军人用语为主，商人用语次之。另外，在教科书的卷尾附有数十页白纸，以供携带者临时备忘之用。该教科书的实用性不言而喻。

《在清从军者之心得》，开篇即指出：“本书之目的为目下日俄战争之时局，在支那事情上，尽吾等绵薄之力。”书中包含汉语、发音等内容，专门为军人而编。在成书之后，印刷 2000 部提供给日军大本营。编者从亲历者的角度，推荐该教科书，其影响程度必然不浅。

《战地宝典：征露从军者必携》内附有《日清韩露会话》，专为征俄军人使用。编者酒井弥吉郎为甲午战争从军亲历者，深知中国战场上的必备品，故该书罗列的必备品清晰明了，作为起沟通交流作用的《日清韩露会话》，被视为必不可少的“战地宝典”。

总之，1904 年度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达 66.7%，其中 5 月一个月之内就出版 12 部之多。战争带来的军用汉语教科书出版的炙热程度可见一斑。

(三)1905 年度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

据笔者统计，1905 年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 23 部。伴随战争接近尾声，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势头明显减弱。据笔者统计，1905 年度共出版汉语教科书 62 部。^① 该年度军用汉语教科书所占比例为 37.1%。具体军用汉语教科书如表 3 所示。

表 3 1905 年度军用汉语教科书

类 别	书 名	编 者	出版社(人)	刊行时间
纯军用	《通译必携：北京官话》	马绍兰、足立忠八郎	金刺芳流堂	1905. 1
纯军用	《日清会话》	粕谷元	文星堂	1905. 6
纯军用	《实用日清会话》	汤原景政	大阪石塚书铺	1905. 9
纯军用	《日清会话》	参谋本部	一二三馆	1905
准军用	《北京官话支那语学捷径》(第 3 版)	足立忠八郎	金刺芳流堂	1905. 2
准军用	《新撰清国时文辑要》	足立忠八郎	金刺芳流堂	1905. 3
准军用	《日清韩会话》	参谋本部	一二三馆	1905. 6
准军用	《冠注高等支那时文读本》	大野德孝	文求堂	1905. 6
准军用	《对译清语活法：附录支那时文速知》	来原庆助	三省堂书店	1905. 6
准军用	《东语士商丛谈便览》	田中庆太郎译(金国璞著)	文求堂	1905. 6

① 六角恒广认为 1905 年度共出版 46 部。参见六角恒広編『中国語関係書目：1867—2000』(増補版)、100 頁。

续表 3

类 别	书 名	编 者	出版社(人)	刊行时间
准军用	《日清会话语言类集》	金岛苔水	松云堂	1905. 7
准军用	《日华会话笺要》(初版)	平岩道知	冈崎屋书店	1905. 7
准军用	《户口调查用语》	台湾总督府警察官及 司狱官练习所	临时台湾户口调查部 发行	1905. 8
准军用	《户籍用语》	市成秀峰	台语会	1905. 8
准军用	《日华会话笺要》(再版)	平岩道知	冈崎屋书店	1905. 10
准军用	《日韩清英露五国单语会话篇》	堀井友太郎	名仓昭文馆	1905. 11
准军用	《北京官话:谈论新篇》第 4 版	金国璞、平岩道知	文求堂书店	1905. 12
准军用	《支那时文评释》(37 年度)	青柳笃恒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05
准军用	《支那时文评释》(38 年度)	青柳笃恒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05
准军用	《三十八年编纂清语学教科书》	陆军士官学校	陆军士官学校	1905
准军用	《清语会话案内》	西岛良尔	不详	1905
准军用	《法院用语日台会话篇》	台北地方法院	不详	1905
准军用	《新编支那语会话读本》(再版)	青柳笃恒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05

1. 纯军用汉语教科书:

该年度出版的纯军用汉语教科书有 4 部。代表性的《通译必携:北京官话》,为中国人马绍兰与日本陆军教授足立忠八郎共著。“绪言”中表明了编写目的:“本书虽为仅由 12 章编成的小册子,但却是收集专为出征翻译者在彼地所需之语言,编纂而成的会话书。”该教科书政治宣传的内容较为醒目,文中例句有:“我的老母亲,今年八十多岁了,因为俄国的兵,胡夺乱抢的,家里不能安静住着,我的母亲老了,害怕得了不得,所以逃出来,投奔亲友的。”又如:“敝国和贵国是同洲的人,如今和俄罗斯打仗,一则是为贵国,二则实在也是为敝国。”

粕谷元著《日清会话》,是将其与他人合编的《日清露会话》中的汉语部分抽出单独出版的。出版时,粕谷元已升任陆军大尉。书中充满军用单词、词组和句子。如:“哎!不要跑!不要跑!跑就杀你!”“你会俄国话吗?”“俄国话叫什么?”“上次(上回)(上趟)是马兵有一百人来的。”“这次(这回)(这趟)是差不多两营的步兵在这儿扎营来着。”“我揣摩着下次(下回)(下趟)是炮兵拉拽几尊的炮来罢。”

又如随军翻译汤原景政编纂的《实用日清会话》,第一编即为军事用语“侦察及斥候”,其中的会话内容有:“这条道是上那儿去的?上奉天去的道儿。离这儿多少里地?有二百多里地。”“在那堡子有俄国兵扎过营么?今儿清早拔队走了。上那儿去了?往西去了。往西去就到甚么地方呢?”该教科书的军事实用性不言而喻。

2. 准军用汉语教科书:

该年度出版的准军用汉语教科书有 19 部。代表性的《日韩清英露五国单语会话篇》,其“序”中指出:“此书专为简单便捷之用,以作未解会话之片语诸君之罗盘针。”该书第一章即为“军事及必要语”,此外,“会话”一章中也有军事内容:“你是兵?”“给我带道儿!”“俄国兵在那儿?”该书的一大特点是没有汉字,只有用日语标注的汉语发音。可见,该书为应急速成之用。

《日清会话语言类集》中有 8 个章节为军用会话,其中例句有:“守炮台的兵,有多少?”“你肯说

实话,就放你们,还给你钱。”“炮队是起那股道,进兵很方便呢?”“马队可以过去么?”编者在“自序”中认为:“不通对手国语言,将无法完成清韩经营之大业。”而且“对手国语言之研究是战后经营的第一步”。所谓“对手国语言”却专指汉语,其针对性极为明确。

综上所述,1905 年度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开始减少。战争在 9 月份已经结束,这是主因。虽然战事已休,但有的编者却已充分认识到中国问题的长远性,这显然与战争胜利的狂热不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日本政府及好战分子内心表露,无疑流露出意欲侵吞中国的野心。

(四)1906 年度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

据笔者统计,战后第一年的 1906 年,共出版汉语教科书 37 部。^① 其中军用汉语教科书共出版 10 部。也就是说,该年度的军用汉语教科书占 27.0%。由于战争已结束,出版势头明显减弱。该年度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如表 4 所示。

表 4 1906 年度的军用汉语教科书

类 别	书 名	编 者	出版社(人)	刊行时间
纯军用	《从军必携日满会话:易记实用》	富山诚一	冈崎屋	1906. 9
准军用	《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订正第 3 版)	足立忠八郎	金刺芳流堂	1906. 2
准军用	《清语新会话》	山崎久太郎(桃洲)	青木嵩山堂	1906. 2
准军用	《清语正规》	清语学堂速成科	文求堂	1906. 4
准军用	《日清会话捷径:北京官话》	甲斐靖	弘成馆	1906. 7
准军用	《日华会话笈要》(增补 3 版)	平岩道知	冈崎屋书店	1906. 9
准军用	《时文类纂》	善邻书院	善邻书院	1906. 10
准军用	《最新清语捷径》	西岛良尔	青木嵩山堂	1906. 12
准军用	《日清会话》	木野村政德	嵩山房	1906
准军用	《日露清韩实用会话》(再版)	池村鹤吉	松阳堂	1906

1. 纯军用汉语教科书:

该年度出版的纯军用汉语教科书仅有《从军必携日满会话:易记实用》一部,书中有“审问”“使役”“车船武器马具”等诸多军用汉语。该教科书主要包括日本军人与中国人密切接触过程中必然遇到的常用语,涵盖日常生活的全貌。

2. 准军用汉语教科书:

该年度出版的准军用汉语教科书共 9 部。代表性的《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为订正第 3 版,由陆军教授足立忠八郎编纂。单词中有“军营”,短句中有“陆军用语”和“海军用语”,会话中有“打听军事”“侦察”“扎营”“讯问”“俘虏”等项。该教科书在战争期间发行两版,战争结束后又发行了第 3 版,1918 年发行至第 6 版,其影响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清语新会话》有“旅顺口陷落”“军务”的会话部分及“军事”的单词内容。在“凡例”中,编者指出:“回顾过往之历史,东洋之风云皆由支那起,近年甲午风云、义和团事件、日俄战争皆以支那为根本。……我同胞接踵渡清之日现于何时,尚不得而知,届时最先之务在于通晓该国之语言。”战争虽已结束,但编者认识到将来中国重要性的同时,更加认识到首先掌握汉语的重要性。

① 六角恒广认为 1906 年度共出版 33 部。参见六角恒广编『中国語関係書目:1867—2000』(增補版)、100 頁。

128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清语正规》的“单词表”中单独列出“军用语”一节,包括“陆军”“海军”“兵器”“兵船”“炸药”“救兵”“敌兵”“兵营”“埋伏”等40个词语。另外,该书语法讲解详尽,而例句仍离不开军用:“有个奸细叫探子给拿住了。”“所有的房子都叫俄国兵给烧了”。而且该教科书还与时事密切结合,“听见说这有二十七人在青年会里演说,都是谁演说?是一个中国革命党的首领孙逸仙,咱们大家去听听去好不好?”《清语正规》原为清语学堂速成科的专用速成汉语教科书,清语学堂速成科是为培养日俄战争的汉语翻译人员而开设的。该教科书在培养汉语翻译人员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视。

通过对四个年度出版的汉语教科书的梳理,我们可以得知,开战前一年的1903年度出版了4部军用汉语教科书,占当年教科书总数的23.5%。然而在开战第一年的1904年度,纯军用及准军用汉语教科书如雨后春笋,占当年教科书总数的66.7%,出版时间之所以如此集中,毋庸置疑是由战争的狂热和刺激带来的。1905年下半年,由于战争接近尾声,军用汉语教科书开始减少,占当年总数度的37.1%,减少近半。1906年由于战事结束,军用汉语教科书仅占27.0%,与开战前一年基本持平。综上所述,军用汉语热与战争是完全同步的,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同样是与战争相伴而生的。

三、日军对军用汉语教科书及随军翻译的“需求热”

日俄战争爆发后,军用汉语热迅速“升温”。除教科书的大量出版,日军对军用汉语教科书的需求数量,以及对汉语翻译人员的急切需求也是这方面的证明。

(一) 日军对军用汉语教科书的急需

据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以数字化形式公开的资料可知,战争期间,日军对军用汉语教科书的需求量极其庞大。

在两国开战两个月后的1904年4月10日,日本陆军电文“副临第800号第1”《陆军副官给第一军参谋长案》中提到,发送参谋本部编《日清会话》100部,并附有第一军内部分配表。^①通过分配表可知,仅第一军所需《日清会话》的数量竟高达7310部。第一军共约65000人,也就是说平均9个人就有1部。足以说明该教科书在整个军队的影响程度。

“副临第800号第2”电文《陆军副官给第一军兵站参谋长案》中提到,发送《日清会话》1370部,并附有“第一军兵站监部内日清及日俄会话分配表”。^②在“副临第800号第3”电文《陆军副官给近卫、第二、第十二师团参谋长案》中提到,发送《日清会话》1980部,并在电文中附有详细分配列表。^③

另外,在“副临第800号第4”《陆军副官给近卫师团兵站基地司令部案》中提到,准备紧急发送书籍23捆,包括《日清会话》《日俄会话》《日韩会话》三种,三者数量相同,均为4060部。对此,据“第65号”电文《近卫师团兵站基地司令部给大本营陆军副官堀内次郎》可知,近卫师团兵站基地

① 「1.19留守第1師団参謀長より旅順要塞司令部図書請求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6040696400、明治38年1・2月分副臨号書類級大本営陸軍副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② 「2.7留守第1師団参謀長より兵站司令部所要図書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6040714000、明治38年1・2月分副臨号書類級大本営陸軍副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③ 「日露会話他図書請求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7082404200、明治38年自1月至4月参谋本部大日記 臨号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司令部在4天后的4月14日即收到23捆书籍。^①足见发货之迅速。

在4月16日“副临第800号第5 加急”电文《陆军副官给近卫师团兵站基地司令官案》中提到,准备紧急发送19捆书籍,其中包括《日清会话》《日俄会话》《日韩会话》各3350部。对于这封“加急”的回电为:“收到书籍19捆。”^②通过电文时间可知,在“加急”电报发出当日即收到书籍。通过军方的调配速度,足见日军对教科书的依赖程度。

据1905年1月10日“加急武第20号副临第149号第1”,留守第一师团参谋长井口五郎给大本营副官堀内文次郎的“照会”可知,旅顺要塞司令部要求紧急发送的9种书籍中就包括8部《日清会话》。^③此外,在2月7日“武第63号 临副第361号第1”电文中又追加了3部《日清会话》。^④一个月后的3月7日,旅顺要塞司令部在给参谋本部的“临第427号第1”的电报中又提出,司令部应“司令部各部、后备步兵队、国民步兵队、要塞炮兵队、要塞医院”之要求,请求参谋本部再次发送15部《日清会话》。^⑤旅顺要塞司令部为《日清会话》而连发三封电报,迫切需求的愿望可想而知。

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满洲”驻军副官事务主事本乡房太郎曾给参谋本部事务主事藤井包总发送过一封加急电文,名为“满洲发第8230号临第1095号第1 加急”。该电文指出,为了在“满洲”进行资源调查,请求紧急发送6部《东亚地区百分之一地图》及10部《日清会话》。^⑥可见,即使在停战后,《日清会话》仍有用武之地,其目的是资源调查。

综上所述,在这场战争中,日军对军用汉语教科书的需求量超乎我们的想象。无疑,这也是军用汉语热的一种鲜活的体现。

(二) 日军对随军汉语翻译的大量需求

虽然军方对于战争蓄谋已久,战前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由于战争形势的扩大,对于汉语翻译人员的需求量逐渐增大。

甲午战争时期的诸多汉语翻译人员,凭借其丰富的战场翻译经验,在10年后日俄战争期间再次踏上中国领土,充当随军汉语翻译人员。据日本学者考证,在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中,有80人成为甲午战争的随军翻译,其中有33人在日俄战争期间再次作为随军翻译出征^⑦,再现率高达41.2%。

开战伊始的1904年2月13日,大本营陆军副官堀内文次郎给陆军省人事局局长中冈默的电

① 「日清会話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6040616900、副臨号書類級大本营陸軍副官管第3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② 「日清会話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6040616900、副臨号書類級大本营陸軍副官管第3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③ 「1.19留守第1師団参謀長より旅順要塞司令部図書請求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6040696400、明治38年1・2月分副臨号書類級大本营陸軍副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④ 「2.7留守第1師団参謀長より兵站司令部所要図書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6040714000、明治38年1・2月分副臨号書類級大本营陸軍副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⑤ 「日露会話他図書請求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7082404200、明治38年自1月至4月参谋本部大日記 臨号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⑥ 「満洲利源調査の爲東亞輿地圖100万分1地圖他農商務省より借用の依頼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7082434900、明治38年自9月参谋本部大日記 臨号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⑦ 野口武「日清貿易研究所生一覽表の作成と『対支回顧録』編纂をめぐる若干の考察」、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OCCASIONAL PAPER』No. 5(2016年10月)、1—20頁。

文中,列有《第一軍支那語翻譯官要員表》,第一軍共需漢語翻譯人員 100 名。^①

另據 1904 年 3 月 9 日大本營陸軍“副臨人第 49 号第 1”電文可知,大本營已錄用 44 名漢語翻譯,這些人中既有參謀本部首批派往北京的留學生,又有甲午戰爭時期的隨軍翻譯,還有領事館職員,以及在中国大陸及台灣地區工作的人員,無疑均具有豐富的翻譯經驗。^②

由於戰爭的不斷擴大,翻譯人員急缺,民間學校清語學堂迎合軍國之需,成立了清語速成科,其目的就是培養陸軍翻譯人員。該速成科成立於 1904 年 3 月,即日俄戰爭開戰不久。^③ 速成科在戰時共招收 7 期學員,入學人數達 520 人,其中通過陸軍省翻譯考試作為漢語翻譯而從軍者有 70 餘人。其他學員,或官或商,行走於中國大江南北者不勝枚舉。^④

那麼,日俄戰爭中究竟有多少漢語翻譯人員從軍呢? 我們根據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的《清語・俄語・韓語翻譯官統計表》可知,日俄戰爭時期的漢語翻譯人員為 890 人,另外,備注欄中又追加 40 人。因此,漢語翻譯人員的總量至少在 930 人以上。^⑤

綜上,日軍對軍用教科書及漢語翻譯人員的大量需求,加速了教科書的大量出版發行,同時,由於翻譯待遇的提高,會漢語者爭相擔任漢語翻譯,這無疑促成了日本全國上下的軍用漢語熱潮。戰爭伊始,位於東京日本橋區的清語學堂,開始招收為期三個月的軍用漢語速成班。^⑥ 另據《讀賣新聞》刊登的位於東京神田區的清語學堂的招生廣告可知,至 1905 年 4 月,該學堂已舉辦 5 期漢語速成班,為日俄戰爭培養出了 40 餘名漢語翻譯。^⑦ 這波熱浪甚至波及了戰爭的對手俄國。日俄戰爭結束不久,俄國也在遠東的哈巴羅夫斯克開設日清語學校,軍人們開始熱衷於日語和漢語學習。^⑧

四、第二次軍用漢語熱的主要特徵

第二次軍用漢語熱是在第一次軍用漢語熱的基礎上形成的,與第一次軍用漢語熱相比照,10 年後的第二次軍用漢語熱具有如下幾大特徵。

第一,軍用漢語教科書的出版數量大增。日俄戰爭時期的 1903—1906 年,至少出版了 79 部軍用漢語教科書,與 1893—1896 年甲午戰爭時期出版的 29 部相比,多出 2.7 倍。可見,第二次軍用漢語熱時期的軍用漢語教科書的出版數量遠遠超過第一次軍用漢語熱時期。

第二,經典軍用漢語教科書脫穎而出。經過甲午戰場的洗禮,甲午戰爭時期出版的一些軍用漢語教科書得以再版發行。如參謀本部編《日清會話》、木野村政德編《日清會話:附軍用語》,均成為經典軍用漢語教科書。尤其《日清會話》更是經典中的經典,訂正再版發行至抗日戰爭時期。

第三,教科書編者的出身較為廣泛。有軍事機關,如參謀本部、第一軍司令部、士官學校;有職業軍人,如陸軍大尉平山治久、陸軍中尉(不久升任大尉)粕谷元;有甲午戰爭的參與者,如酒井彌

① 「通訳官配属予定表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6040560300、明治 37 年自 2 月 8 日至 2 月 26 日第 1 号副臨号書類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② 「3 月 9 日 関口隆正外 43 名採用方見合はされ度申進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9121994800、明治 37 年自 2 月至 5 月 大日記 副臨人号 自第 1 号至第 212 号 共 4 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③ 六角恒広「清語正規解題」、六角恒広『中国語教本類集成』第 2 集、11 頁。

④ 原口新吉「清語正規序」、清語學堂速成科編『清語正規』、文求堂書店、1906 年、1 頁。

⑤ 「附表第 4 清語・露語・韓語通訳官統計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6040186300、明治 37、8 年戦役陸軍省人事局補任業務課詳報(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⑥ 「清語學堂 3 か月で軍用中国語を速成」、「読売新聞」(朝刊)、1904 年 2 月 19 日、2 頁。

⑦ 「神田の清語學堂が第 6 回速成科生徒を募集中」、「読売新聞」(朝刊)、1905 年 5 月 19 日、3 頁。

⑧ 「ロシア軍人の日清語研究熱盛ん」、「読売新聞」(朝刊)、1907 年 1 月 14 日、1 頁。

吉郎、山岸辰藏;有甲午战争时期的随军翻译,如平岩道知、西岛良尔;有日俄战争时期的随军翻译,如西岛良尔、汤原景政、来原庆助;有大学及陆军教授,如青柳笃恒、足立忠八郎、宫岛大八。编者身份如此广泛,无疑说明日俄战争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海外战争。另外,编者又大都具有中国留学经验,如平岩道知、西岛良尔、足立忠八郎、宫岛大八等,这些地道的“中国通”,完全迎合了日本政府的利益需求。

第四,教科书涉及的语种多、适用面广。甲午战争时期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最多也就日清韩三国语言。但由于此次战争牵涉国家多,因此,会话教科书的语种大增,不仅有日、清、俄、韩四国语言会话,甚至有《日韩清英露五国单语会话篇》,便于多国人员间的语言交流。

第五,有些教科书编纂于战场。《实用日清会话》编于奉天战场;《对译清语活法:附录支那时文速知》编于辽阳州半拉山子驻军地;《满洲土语案内》编于韩国镇南浦。这些教科书内容来源于真实战场,其实用性自不待言。

第六,速成汉语教科书增多。如《满洲语会话一个月卒業》《清语三十日间速成》《清语会话速成》《兵事会话:支那语速成》等短期速成会话教科书,完全是为了应急之需而编纂的。

第七,教科书中充斥着“褒日贬俄”的政治宣传内容,编者均非常重视对中国人的政治宣传。褒扬日本的内容如:“你们不是我的仇敌,我们是替你们打俄国来的。”^①“啊!你们是日本国的兵,很好!我素常就听说贵国的兵都很讲理的。”“贵国的大队到敝处来,真是仗义的很哪!”^②“日本兵规矩得很哪!”^③与其相反,贬抑俄国的句子如:“所有的房子都叫俄国兵给烧了。”^④“我们这回打仗,因为俄国兵乱闹你们这地方。”“俄兵都不是东西,他们没有一点儿好心哪。”^⑤“俄罗斯兵很不规矩抢东西杀良民。”“俄国兵抢了去的多。”^⑥“去年俄国兵来扰害我们这儿,已经拉走了二百多的牲口去了。”^⑦类似的“褒日贬俄”的句子充斥着绝大部分军用汉语教科书,其目的无非就是让中国人“仇俄亲日”,有利于战事的顺利进行。

总之,第二次军用汉语热与第一次汉语热相比,具有上述七大特征。第二次汉语热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形成的,且其热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汉语热。可以说,日本这种以军事战争为背景的汉语热潮,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五、结论

通过对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第二次军用汉语热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任何一个国家,其语言政策与国家战略是息息相关的。战时日本倡导汉语学习的政策导向,源于其侵华野心不断膨胀的国家战略。甲午战争取胜的成功经验,在日俄战争中得以再次彰显。其中,整个日本社会出现的汉语热潮无疑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语言的功利性及侵略属性在此次汉语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日俄战争时期催生出来的近代日本的第二轮汉语热潮,完全是在战争刺激下形成的扭曲

① 宫岛大八编《官话急就篇》,善隣書院,1904年,115页。

② 馬紹蘭、足立忠八郎《通訊必携:北京官話》,金刺芳流堂,1905年,28、56页。

③ 大澤編《滿洲語會話一ヶ月卒業》,30页。

④ 清語學堂速成科編《清語正規》,170页。

⑤ 金島苔水編《日清會話語言類集》,松雲堂,1905年,337、374页。

⑥ 大澤編《滿洲語會話一ヶ月卒業》,30、53页。

⑦ 足立忠八郎編《北京官話實用日清會話》,金刺芳流堂,1904年,228页。

的汉语热。战争所带来的汉语热,是以军用汉语教科书大量出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教科书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这种汉语热充分表现出军事侵略的目的性,可以说,军方的汉语学习完全是将汉语视为战争与侵略的工具来利用的。

第三,通过大量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内容可知,教科书中充斥着“褒日贬俄”的内容,无疑是为了让中国人“亲日仇俄”,也与中国暗中的“联日抗俄”政策遥相呼应,最终达到使战事顺利进行的目。另外,军用汉语教科书中的军事用语,同时暴露了日本军人对中国人采取的简单粗暴且充满歧视的态度。

第四,通过军用汉语教科书的编者身份我们可以发现,这场战争不仅属于军队与职业军人,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民间人士均积极参与战争。日本政府派遣的来华留学生,除了充当随军汉语翻译外,还充分利用汉语优势,积极编纂军用汉语教科书。这些利用中国培养出来的“中国通”,积极参与到战争的每个环节。可见,此次战争是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举国战争。这些编者连同其所编纂的军用汉语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煽动了举国战争的狂热。

第五,军用汉语教科书及随军汉语翻译的大量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日本的汉语学习热潮。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军用、殖民、经商等功利性日益增强,这为侵华战争时期出现的第三次军用汉语热奠定了坚实的出版基础和良好的出版土壤。换言之,军用汉语热无疑也助推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并为全面侵华做出了语言上的铺垫工作。

总之,对军用汉语教科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日关系以及日本侵华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资料。因此,我们有必要正视此类汉语教科书出版的历史现象,其历史的反面作用不容忽视。

〔作者寇振锋,辽宁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来特)